

徐青甫和他的
《经济革命救国论》



XU QINGFU HE
TA DE 《JINGJI GEMING JIUGUO LUN》

徐起政 编著

徐青甫和他的 《经济革命救国论》

徐起政 编著

XU QINGFU HE
TA DE 《JINGJI GEMING JIUGUO LUN》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青甫和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 徐起政编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308-16809-0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徐青甫(1879-1961)—人物研究②经济政策—研究—中国—民国③《经济革命救国论》—研究 IV. ①K825.31②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837 号

徐青甫和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

徐起政 编著

责任编辑 樊晓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张振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5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809-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大约在1987年，六哥徐起唐告诉我，他想重印我们的爷爷徐青甫1932年出版的专著《经济革命救国论》，并嘱我成书后认购十分之一。记得当时总共印了1000册，我如约购买了100本。

拿到书后，我把爷爷的著作陆续赠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对经济学研究有一定兴趣的人，自己也抽空浏览了几遍。但由于当时我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和了解还不够深入，加之这本书是老式的竖排版，且是影印本，字迹模糊，阅读比较困难，因而未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著作的内涵，更谈不到将它与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并且持续了30多年。直到2007年退休，才有机会再次拿起爷爷的书，认真捧读。也是在这时，我才读出了当年未能读出的很多东西，深感爷爷这部著作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以说，这是我重新出版爷爷这部专著的初衷。

我的本意是想直接重印这本书，只是想把竖排改为横排，减少人们的阅读障碍。然而，当我打算着手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早已有人开始关注爷爷的这部著作，并且早已在研究爷爷本人和他的学术成果了。

首先是沈凯璋先生写于1990年的《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原载《北仑文史资料》，见本书首篇）。沈先生在文中梳理、介绍了爷爷的生平和理论建树，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徐青甫是一位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对问题有独立的见解。值得称道的是，徐的著述都是从救国富国的立场出发，针对社会积弊，以一个银行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直陈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光彩。”



接着,山西省阳泉市学历史出身的离休干部张振华先生一口气读完爷爷这部著作,情不自禁地写下《论徐青甫和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一文(见本书第2篇)。张先生在文中谈道:徐青甫先生做官一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以权谋私;二是每次都是不得已才接受任命;三是每次赴任都是在国家形势的关键时刻;四是从不问官位大小,职务可高可低,官阶能上能下;五是一旦觉得上面政策有变,立即辞去官职,毫不恋位。一言以蔽之:“徐青甫先生真正是立志做大事者,‘做官’也是为了更好地去做‘大事’。这样的官员,真是古今难求。”

为了使爷爷的著作在重新出版时更有分量,我专门走访了当代经济学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生春先生,请他撰文推介,从专家视角为这本书做一个定位和评价。周先生欣然命笔,撰写了《〈经济革命救国论〉评述》一文,以作为爷爷这部专著的导读——

“《经济革命救国论》是一部多年来被人忽略的著作,徐青甫则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学家,而两者在今天均不应再被轻忽,遂决定为之序,使其隐匿不彰之价值得以表而出之。

“徐青甫具有现今学术界所十分推崇的独立、批判和务实、创新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经管类出版物不同,《经济革命救国论》是一部经受了80多年时间考验,其影响与价值却有增无减的著作。

“徐青甫的《经济革命救国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富有批判、创新精神,具务实、可行的特点,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一种独立的途径与方法。《经济革命救国论》初版时面临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其理论上的批判、创新,与解决危机务实、可行、独到的方法,又与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发展阶段及人们的观念十分契合,令今人读来仍感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新意,这都使其得以历久弥新。

“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切实解决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与深入研究、参考、借鉴徐青甫的思想。《经济革命救国论》不应再被忽略,经济学家徐青甫不应再被忽视。”

几位学者和专家的评价,使我重新认识到爷爷其人其作的价值和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做这件事的原动力,使我对这部著作的重新出

版深具信心。

承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周悟拿博士将《经济革命救国论》自序、书后及跋译为适合今人阅读的白话文。

我的作家朋友马青特地将全书录成横排简化字版,并且初编了全部文稿,手绘了书中的全部图表(由竖排转换为横排)。

本书责任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樊晓燕博士慧眼识珠,为玉成此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虽然我自幼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二老身边长大。但以往只知道爷爷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在整理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多种渠道了解到爷爷的一些生平事迹,结合自己的记忆,写下忆文《我记忆中的爷爷和家族二三事》,聊表对爷爷的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意在让今天的人们了解我的爷爷徐青甫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知道早在那个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自己的经济学家。

假如爷爷这部专著的重新出版,能够引起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关注,使更多当代的有识之士认识我的爷爷——一位民国时代中国经济学家的爱国情怀、经济观点和改革理念,我心足矣!

徐起政

2016年5月于杭州

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

沈凯璋

徐青甫(1879—1961),原名鼎,小港顾家桥村(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编者注)人。3岁随母迁居杭州,先后就读于私塾、义学。清光绪末科举人。戊戌变法之年在杭州设塾为生,并入日文学堂学习日语。翌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先后任翻译、助教、教授等。曾与人一起组织“争存会”。又募集资金,在杭州设立图书公司,业余从事著译工作,后以亏损而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先后在奉天省巡警总局、奉天审计处、湖北省清丈局等处任职。辛亥革命后,一度在上海经商。其后历任浙江诸暨、湖北通城等县知事。后弃政从商,在奉天等处中国银行任职。1922年后任浙江省政务厅厅长、财政委员,协助建立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1927—1932年返故里读书著述,撰《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提出救国富国十三策及改革步骤。5年后复出,1934年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曾一度代理省主席,以清廉自居。1938年后,先后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国民参政员、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1939年举家迁居香港,继至重庆。1949年后,应邀参加浙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任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带头认购公债两万多元,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曾撰写《粮食问题之研究》《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粮食调节问题》等论文多篇及《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在经济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徐青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其出版于1932年4月的《经济革命救国论》,虽然是一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的办法来救国富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著作,但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反对封建传统、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书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或进步的,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参考价值的内容。《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广泛的论述、精细的分析、大胆的建议,足见其宏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研究这些内容,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徐的著作,这里不可能做系统的述评,仅略作简介,俾乡人了解徐之生平。

徐青甫,原名徐鼎,清光绪五年(1879年)夏历三月十二日生于枫林乡顾家桥(今属北仑区小港街道)。家贫少孤,赖母姐针黹所得,养育成人。3岁随母到杭州,在私塾读书两年,义学读书两年。之后,曾攻读战国申韩之学,乡试中举。因急于谋生,游皖南北4年。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富国的途径。至19世纪90年代,国内学习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年轻的徐青甫开始懂得,不学新知识则无以救国。因此,他设法购得算学方面的书籍,如《华氏笔谈》《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学大成》等,自修得其大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由皖返杭谋馆,暂资糊口,其时,又进日本人在杭州开设的日文学堂学习日文。由于生活艰辛,连每月2元的学费也无力支付,只好与同业蒙师的四位朋友商量:一人去学日文,回来传授。这样,五个人可以只交一份学费。因徐的年龄最小,且记忆较佳,就由他出面去学堂学习。此后,他每天上午去学日文,正午回家,下午要教书,晚上再向四位朋友转授日文。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不便才解约,当时幸值季考,徐名列第一,得免学费,继续学习。

自次年冬起,徐青甫进浙江武备学堂,任翻译、助教、教授共七年。在此期间,曾与求是书院和浙江武备学堂两校的有志青年蒋尊簋^①等九人组合“争存会”,不多时,由于清政府查逮,同时又缺乏经费而停止活动。此时,徐已进一步认识到,若不更新国人知识,则不能使国家富强。因而又自筹资金,在杭州珠宝巷开设书店(名曰图书公司),并在武备学堂教授之

^① 蒋尊簋,字百器(1882—1931),浙江省诸暨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

暇从事译书出版,两三年中,因书店亏损,赔尽译书稿费,尚亏损两千余元。为了归还借款和一家人生活,失去了赴外国留学的机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债累稍轻,即去外地谋职,至宣统三年(1911年),分别在奉天、湖北等地任职,先是经友人介绍,任奉天省巡警总局交涉股长,后改行政科长;旋任湖北清丈稽核兼江汉关交涉等职,此后,复任奉天警局行政科长。其间,调办安东商埠警务,奉派去长白山下调查安图(今吉林安图县)设治事务两个月,又去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三个月,回国后,奉派筹办奉天兴业银行,由于计划改变,又去奉天审计处任事。曾应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①之聘任东三省密查,后因辛亥革命政局变化而中止。

辛亥革命后,携眷南返,徐青甫旧时朋友与门徒不少是杭州光复的有功者,有的被邀在军署任职,徐见此时代人多事少,仍留沪从事商业。

1912年冬,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并进而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徐青甫见“政治趋势,渐兆复古”,乃弃政从商,在奉天中国银行出任出纳约七年,后因徐母思子心切,乃调返浙江中国银行任事。

1922年冬,浙江省省长张载阳^②任命徐青甫为省政务厅厅长,其时,徐为中国银行行务正在外地考察,回杭后坚辞不准,从而复入政界。1923年9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家,在徐青甫的协助下,议定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归官股接办,更名浙江地方银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归商股接办,为浙江实业银行。1924年,因江浙军阀战争(齐卢战争)爆发,张载阳卸职,徐同时离开省政务厅。

1926年,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徐青甫担任浙江省财政委员。1927—1932年年初,徐息影家园,旷观全球,研究中国国情,思索救

^① 叶景葵,字揆初(1874—1949),杭州人,曾任大清银行正监督、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经理。

^② 张载阳,字暄初(1873—1945),浙江新昌县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浙江省省长。



国之策，写成《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该书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经济学说，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救国富国的十三项方策，以及改革的步骤。《经济革命救国论》于1932年4月出版，由浙江经济学会代发行。魏颂唐先生在跋文中说：“今日之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极度……吾浙徐青甫先生本悯世救国之愿，出其数十年学问事业之心得，刊行《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

1934年下半年，徐青甫一度代理浙江省主席。当时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常在莫干山“养病”，在职三年中，只有蒋介石到杭州时他才不得已下山就会公事，各厅处工作极为混乱，财政十分困难，靠发公债过日子；同时，由于“桂系”反蒋暗流逐渐明显，黄绍竑奔走国民党中央与“两广”之间，竭力疏通和解，希望不要发生“内战”。在政治暗潮斗争激烈的情况下，黄绍竑提请民政厅长徐青甫代理省主席。同年12月21日，黄绍竑到杭州就任省主席，徐青甫调任省民政厅厅长。黄绍竑主浙之初，浙江经济危机重重，发放公债2000万元，入不敷出，而且财政实权落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黄绍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说：“镇海县的徐青甫懂得理财，你可问问他。”黄遂提名徐青甫任财政厅厅长。

徐青甫为官清廉，为人所称道。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省人民银行任职的沈光熊（曾为徐的下属）在其提供的资料中说，当时省财政厅厅长是个肥缺，可徐不为自己捞钱，凡是不应私人所得的，都让会计算了全部上缴，这在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是难能可贵的。

1937年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继续会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问题。同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推定委员常委为徐青甫、竺可桢、马寅初等十余人。1938年4月，徐等八人为浙江推定的国民参政员。1939年2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府圈定：正议长徐青甫，副议长陈杞怀，参议员有张元济等二十余人。同年由于思子心切（其子徐继庄，系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经理，此时在香港），举家前往香港。1940年又迁居重庆。

1941年秋冬之间，徐青甫写成《粮食问题之研究》一文，分析了粮食问题之症结，研究了战时粮食供求情况，评述了粮管政策的改进意见。1945

年11月，他在浙江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建立通资联营组织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政企职责分开，通过建立各级通资联营组织，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1946年又在浙江省参议会提出正式提案，经该地决议电请中央及省府采纳。同时，又在杭州公开讲述自己的主张。徐的讲稿由力余学社记录，以《通资联营组织与本省经济之关系》为题，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后来，《浙江经济》月刊又将此文请徐订正，转载于《浙江经济》第一卷第五期，题目是《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在浙江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反响。《浙江经济》第一卷第六期刊出了沈松林与胡绍箕对徐文的讨论文章。次年1月，《浙江经济》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徐的第三篇论文《三讲通资联营组织与发展经济之关系——并答胡绍箕、沈松林两先生》。次年7月，《浙江经济》第三卷第一期还发表了徐的《粮食调节问题》一文。

徐青甫是一位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且不唯书，不盲从，敢于直陈己见，这一点可从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谈到，徐青甫读书很用功，他新书旧书都看，也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英文能看，日文也能看。而且，他自信心很强，对问题有独立的见解。值得称道的是，徐的著述都是从救国富国的立场出发，针对社会积弊，以一个银行家、经济学家的眼光，直陈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光彩。他的数万册藏书，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徐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他在家中会见沈光熊时谈到，南京政府做的一些事情不得人心，共产党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徐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有所评论，他说：“（对于共产党）予虽未知其中组织如何，究竟目的如何，以及其手段如何……马克思乃热心社会之学者，为私有财产致社会成为不平，欲救世而创此主义者也。故予知第三国际之所在乃救世的而非害世的……”在20世纪30年代，徐公开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可贵的。

在《经济革命救国论》中，徐青甫对按劳分配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说：“劳有心力之分，心之成效大，力之成效小，宜厚心而薄力；劳有智愚



之分,智者成效巨,愚者成效细,宜厚智而薄愚;劳有总散之分,总者关系重,散者关系轻,宜厚总而薄散;劳有勤惰之分,勤者成功多,惰者成功少,宜厚勤而薄惰;劳有难易之分,难者其能高,易者其能低,宜厚难而薄易。各社会阶级宜以平等目光互相尊重,辨别心力智愚,审察责任总散,查核勤惰难易,以为分配标准。”徐对教育子女问题,又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今天更有其现实意义。他说:“多留财产于子孙,不过养成其骄惰游荡,减少其能力,堕落其人格,戕贼其身体,丧失其名誉……为子孙计,唯有不给以财产而给以智识与能力,使其随时随处足以自立而不危,方真为爱惜子孙。”

新中国成立后,徐青甫参加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徐青甫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社会活动),还担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为了带动各界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购买建设公债,徐变卖了家私,买了两万多元公债。

1955年,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当年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徐青甫的名下这样写道:“徐青甫,77岁,清朝举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浙江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等职。住址:杭州长生路34号。”1958年10月,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1年7月16日,徐青甫病逝在杭州,时年83岁。

论徐青甫和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

张振华^①

徐青甫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值得关注的人物。

徐青甫起伏跌宕而又富于传奇的人生，丰富而有趣，精彩而辉煌。他只读了四年国学，就考中了光绪末年的举人；仅靠业余学习日文，就掌握了日文的阅读能力，当上了日文翻译和教授。他全凭自身的努力走向成功之路，从一个基层的科长成为一个省的代理主席，从一个小小的出纳成长为著名的银行家，从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热血少年，成长为一位儒雅的学士。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徐青甫完全靠勤奋自学，写出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巨著——《经济革命救国论》。

笔者无法用一篇文章来书写徐青甫全部的人生经历，只能概括地从以下几方面，来撷取他璀璨生命中的正能量和闪光点。

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徐青甫(1879—1961)，原名徐鼎，清光绪五年夏历三月十二日生于浙江镇海枫林乡顾家桥(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困，仅靠寡母和姐姐给人家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3岁便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杭州去讨生活。年事稍长，在家中租住的房子附近，只读了两年私塾，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去改读“只求粗识文字”的

^① 张振华，山西阳泉市离休干部。



为贫苦人家子弟开办的义学。

之后，徐青甫又靠自修攻读了战国时期法家的申韩之学，并在清光绪末科的乡试中考中了举人。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富国之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习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此时正值戊戌变法前夕，进步的新学兴起，一向爱读书的徐青甫浏览了不少当年十分时尚的新闻杂志，从而树立了“非求新不能救国”的理念。他在坊间买了不少算学之书，有《华氏笔谈》《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学大成》之类的数理书籍，完全靠自学掌握其知识的内涵和精华，与时俱进，用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中国开始了戊戌变法。这年冬天，徐青甫不愿再让母亲和姐姐靠做手工养活自己，为了独立生活，他在杭州开办了私塾，凭自己学来的知识给儿童教学，赚钱贴补家用。就在此时，有日本人在杭州开设了日文学堂，若想进这家学堂学习，每月须交两块银圆的学费。徐青甫也想去，但家中没有这个财力，恰巧与他同为蒙师的四位好友都有学习日语的心思，于是共同协商，众人出钱，一人去学，回来再向其余四人转授，就可省去不少费用。五人中因徐青甫年纪最小，记性又好，于是大家推选他去学习。

从此，小小年纪的徐青甫每天上午去日文学堂学习日文，正午回家在私塾教学，傍晚大家陆续来他处转习。这样他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才能结束工作，睡眠很少。后来由于几位同学住地远近不一，加之有时刮风下雨，往返不便，几个人先后解除了先前的约定。

在日文学堂里，开始的 3 个月学费共计 6 元，四位朋友凑了 4 元，徐青甫个人勉强凑上 2 元。由于他季考名列第一，因而获得校方奖励，免去了后面的学费。夏秋两季考试，他仍荣居冠首，所以始终得以免费，继续学到毕业。可见徐青甫是多么勤奋好学。他一生秉持的学以致用的好习惯，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年冬天，徐青甫就去浙江武备学堂担任了日文翻译，然后陆续从助教升至教授，在那里一待就是 7 年。

在不断的学习中,徐青甫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越来越关切,从小就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他能从古代的烈士以及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中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从而效法他们,并愿以毕生的实践身体力行,甚至不惜慷慨就义,去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

浙江本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力量最强的地区之一,既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所在地,又拥有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领军人物。博览群书,加之深受这些革命人物的影响,徐青甫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树立了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参与了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爱国行动。

续写的生命篇章里,徐青甫为国家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不仅培育出色有为的子孙,还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具有学术价值的经济学巨著。

“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是他一生遵循的准则

孙中山先生曾在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欢迎会上发表题为“学生应立志做大事”的讲话,从此,“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便成为中国一代青年包括徐青甫的座右铭。

为了争取浙江财团的支持,蒋介石曾专程前往杭州,召集所有故乡同志一起商讨有关治理浙江之事宜。为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徐青甫实在不能不积极参与,但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心愿:“予本人则除望国家太平外,无所希冀。各同志以大义相责,不敢固辞,但先以二语相约:一不入党,二不做官,以军事期间为限,当不顾牺牲,尽一分子之责。”

徐青甫所言“尽一分子之责”,有下列记录为证。

1899年,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商定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图谋以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西太后,拥戴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之时,徐青甫积极参与,决意以死力谏江南总督刘坤一。

1900年,徐青甫回杭州后,又与武备、求是两所学校的9名有志青年组建了“争存会”。这是20世纪初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个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其中就有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浙江都督的蒋尊簋(字百器,



又名伯器)。

1911年武汉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徐青甫异常兴奋,携带家眷南返,回到故乡杭州已是光复以后。他本想做一番事业——因为光复有功的不是旧日朋友就是曾经的学生,但他又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争夺与是非,便只身去上海从事商业经营。

1912年冬,蒋尊簋时为浙江都督,因为诸暨县是其家乡,号称难以治理,经诸暨多数同学的举荐,认为徐青甫是蒋尊簋都督的好友,担任该县知事比较合适。这次徐青甫欣然接受诸暨知事职位,因自己身正,又大公无私,一年之内便把诸暨县治理得风生水起。后为避本省做官的瓜田李下之嫌,又专程赴北平调考,后去外地任职。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进而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于1915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徐青甫其时正在湖北省通城县知事任上,见“政治趋势渐兆复古”,十分反对,毅然弃政从商,回到奉天担任中国银行出纳之职。

1925年,蒋介石以总司令身份,召集故乡同志一起商议治理浙江的事务。徐青甫考虑到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军阀割据,自己实在难以推脱,所以在国共合作的秘密状态之下,就任浙江省财政委员之职。

1934年12月21日,黄绍竑到杭州就任浙江省主席,上任之初,浙江省地方经济危机重重,发放了两千多万元公债,依然入不敷出,而且财政实权落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黄绍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说:“镇海县的徐青甫懂得理财,你可问问他。”黄遂提名由徐出任财政厅厅长,全省经济方才转危为安。

1937年8月初,日本侵略者大举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周恩来专程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与合作组织形式等事宜。8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推定徐青甫、竺可桢、马寅初等十余位知名之士为常务委员(参见沈凯璋文《近代经济学家徐青甫》,下同)。

1938年4月,徐青甫等八人为浙江推定的国民参政员。1939年2月,浙江省成立临时参议会,国民党中央政府圈定:正议长徐青甫,副议长

陈杞怀，参议员有张元济等二十余人。徐青甫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行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之际，徐青甫既没有追随欣赏自己“懂得理财”的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去他热爱的经济金融中心香港，而是坚定地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徐青甫就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他在家中会见下属沈光熊时谈道：“南京政府做的一些事情不得人心，共产党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胜利。”（参见沈凯璋文）

新中国成立后，徐青甫一直以无党派爱国人士身份参加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社会活动，还担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为了带动各界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购买建设公债，徐青甫还变卖家私，买了两万多元公债。

当年发行的建设公债叫爱国公债。由于受国民党败退时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人被国民党不断发行的新货币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在国共两仍处于对峙状态的形势下，积极认购新中国的债券就是热爱新中国的具体表现。

1959年，当徐青甫先生最小的孙女徐起政要去西北宁夏支边的时候，家里人都极力反对，只有徐老先生十分支持，对孙女说：“国家的号召，年轻人不响应，谁响应？”徐青甫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晚辈们。

纵观徐青甫先生的一生，几乎在有关键的时刻，他都能坚定不移地朝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方向前进。这源于他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不断学习吸纳新的知识，与时俱进。“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在徐青甫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再说徐青甫“不愿做大官”，那只是他自己主观意愿不想去做，并不是他不能做或没有做过。徐青甫不想做官，但是他不仅做了官，而且做过一些相当大的官。且看他一生坐过哪些官位：

1912年冬，蒋尊簋任浙江都督时，徐青甫担任诸暨县知事（官名，辛亥革命后废府、州，仅设县，置县知事一人，为一县最高行政长官，后改称县长）一年多。